

# 决策参考

2021年第3期（总第64期）

南阳师范学院

发展规划处  
高等教育研究所 编

## 本期要目

### 高教视点

何谓“新文科”？·····（1）

“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9）

### 教育资讯

新文科建设大事记·····（18）

### 他山之石

推进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方向与举措·····（21）

新文科建设典型案例·····（28）



## 高教视点

### 何谓“新文科”？

王学典

近一两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在下力气推动“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并设立了相应的建设领导小组，其中，“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尤其敏感，因而特别引人注目。但什么叫“新文科”？与之相对的“旧文科”是什么？新旧之间的差异何在？新文科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均是当下学界、特别是高等教育文科各领域普遍关心但又感觉不易把握的问题，因而亟需一场讨论甚至一场辩论予以解答。笔者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同时由于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担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山东大学从事新文科建设的氛围因而格外浓厚，这就更激发了笔者的思考。在此，笔者先把自己若干不成熟的想法抛将出来，以作引玉之砖，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 新文科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巨大距离。文理工医等现代学科分类从一开始就移植于西方，完全照搬自西方。不仅大的分类体系如此，小的分类体系如所谓“文科”内部的分类体系也同样如此。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分类框架，无论大小，皆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取自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新文科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

“五四”前后，我们开始了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曾照搬过苏联的学科分

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开始了第二次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提倡在高校的上述学科尽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科书。这种移植如同上面所说，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现代学术空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从欧美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本身尽管都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但是这些学科浓厚的西方气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上。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些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还是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人尖锐指出过：“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著名的“人类学中国化”主张者吴文藻先生当时也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尽管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正是鉴于这一以往的教训，正是在以往学界努力的基础上，2016

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这样一个挑战或任务。在笔者看来,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顺理成章的当然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当然就是所谓的“新文科”。在这方面,文科各门类毫无疑问都有许多艰巨工作要做,但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这些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的锻造方面,面临的任务似乎更重。

### 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

新旧文科之间,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另一点差异,就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换句话说,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这是学科发展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就是那种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文科。

大家知道,分科治学是现在所有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没问题。不分科,我们没办法实现专业化、专门化,而没有专门化和专业化,研究根本无法深入。但问题在于,这种分科治学的学术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初始时代的产物。大工业初起时特别强调分工,分工才有效益,分工才能提高效率。这就是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拿出相当的或者最重要的篇幅谈分工的重要原因。斯密曾举过一个例子: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制针业,生产一枚扣针,需

要十八道工序，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操作。如果不分工，单个工人无论多熟练，“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而现在，即使只有十个人来承担这十八道工序，“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斯密接着说：分工产生效率这一事实，导致分科治学的出现，他以哲学为例说：哲学研究这时“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而“这种业务或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像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总之，分科治学是工业革命初起时产业组织范式在学术上的投影。大工业初始时代特别强调分工，这一点投射到科学研究上，就是特别强调分科，特别强调学术上的精细分工。

产业的组织形态左右着科研的组织形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更强调学科联合，更强调学科融合、科际融合，乃至现在的新趋势不是“联合”“融合”“整合”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等。继数学成为各学科的工具之后，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也都已经工具化了。文科中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正在向工具化转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学科交叉？就是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学科界限或精细分科治学的弊端了，问题的存在已经很严重了。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学科分类，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工农医等等，已经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考上了大学，我来大学读书，

我必须被放到一个专业里边，你学政治，他学经济，另外的人学数学，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学习，猛虎吃天还得找个下牙的地方。但对于科研而言，不是这样。现在的分科已经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壁垒。将来的学术形态、学术组织形式肯定将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变迁，整个科研的组织形态不可能我自岿然不动！现在为什么格外强调团队？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通政经法，但组织团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跨学科的问题学科交叉的问题打通学科壁垒的问题，可以通过团队的形式和规模来实现。文科需要不需要团队？完全需要，甚至于文科更需要团队。团队将是未来文科科研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同分工单干曾是以往文科科研的基本形式一样。

### “重问题轻学科”的“新文科”

新旧文科之间的第三点差异，我个人认为，是新文科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大家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科建设叫得特别响，堪称轰轰烈烈。但其中一个由来已久的弊端，就是现在的学科建设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重问题轻学科”，可能将是新文科的核心追求。

那么，我们衡量学科最常用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否博士点或硕士点，然后是梯队配置，如正副教授多少，年龄结构是否合理，然后是承担了多少国家项目，还有就是在国外A区或者是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以上就是我们衡量学科的基本标准。所以大家都在大张旗鼓地搞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没人问。在笔者看来，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是为了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的学科建设已经出现了较大偏差。现在的所谓学科建设

如同一个手术师一个外科大夫一样，他成天打磨自己的手术刀，你看我这手术刀多好，多漂亮多精致多豪华多锋利，但他忘了手术刀的存在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是为了救死扶伤。大家知道经济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约束条件下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究竟解决了多少困扰我们的发展问题？法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方面，法学又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政治学的存在是研究制度安排与运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学又有哪些作为呢？总之，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了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

我个人认为，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就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敝人所在的《文史哲》编辑部，于十几年前就提出过一个编辑方针：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譬如说研究乡村社会的转型，或研究一个村落的变迁，这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政治学的问题？抑或是法学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历史学的问题？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说也一样，它什么都是：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也是法学问题，也是人类学问题，也是历史学问题，甚至还是农学问题，是气象学问题等等，因此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研究现代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城镇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中国道路，对应的是什么学科？长期以来，我们只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略了学科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忘记了学科设立和存在的初心是什么。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绝不是为了巩固分科，强化分科，或者搞什么学科建设，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下一步要突破的瓶颈，就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改变当下这种“重学科轻问题”的价值追求。



## 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与“新文科”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绝非偶然，绝非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它实际上与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密切相关。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相适应的文科可能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学术大转型，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国学术来取代民国学术，即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第一次大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文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都非常清楚，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形成的一个最大共识，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个最大共识，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这之前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学科学术体系，已经被西方化或者是现代化的学科体系所取代，这实际上是近40年来学术发展的一场巨大运动。这场深刻的学术现代化运动，构筑起了一个完备的而且能与世界接轨的人文社会科学成熟框架。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我上面说的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那些学科，我们正处在这个过程的初始时期。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3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种模式。

### “新文科”与“新时代”

还应该看到，“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学术界跨入“新时

代”密切相关。应该看到，学术界的内外形势，现在均已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动，不管是否自觉和自愿，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都在重建与现实的联系，与政治的联系，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在近40年之前，几乎每个学科都在努力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化，乃至去理论化，都在追求“学术独立”。而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可能将会成为未来新文科的突出特征。

废弃“学以致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在拒绝了“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中，总之，返回自身向内走，是“文革”结束以来，文科发展的一种基本倾向。

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到了90年代，“现实”才真正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热的社会巨变，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学院派研究。一段时间内，校园的院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精神活动的边界。

学院派的学术研究要不要关照现实？校园的学者要不要有超越专业目标的现实关怀？国家民族的巨大需求要不要关注？这里事实上提出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知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学术认识的过程中，“现实”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是一种正面的因素？

“文革”后一段时间之内，人们普遍认为：为现实而研究学术必定导致歪曲研究对象的真相。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

何“学术”，“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史学学术史上有大量事例说明了一点：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没有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的政治信念和现实诉求，也根本就不会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现在，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看来已趋向终结，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缔结更加紧密的新关系，似乎将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的最鲜明特征。（作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第005版）

## “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

樊丽明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社会思想风云激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新时代、新形势呼唤高等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他强调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2018年9月

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发出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动员令，提出了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要求。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推进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讨论“新文科”建设，首先要注意文科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内容的多元化。按照研究对象和任务，文科可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常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的精神文化现象，包括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侧重于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社会现象，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按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除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外，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八个学科门类都可纳入“文科”范畴。这决定了“新文科”建设内容的广度更宽、难度更大，也要求“新文科”研究与建设应有分类思维，方能提高成果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二是其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人文社会学科既是事实科学，追求客观真理，又是价值科学，追求具有主观标准的美和善，是客观和主观、事实和价值、真理和规范相统一的科学，具有科学认识和意识形态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秉持科学的原理和法则，按照科学的逻辑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得

出科学的结论,以保持科学的理论品格,实现科学的认识功能,这种真理具有唯一性。另一方面,它又以人类自身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意识形态功能,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要自觉地维护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因此,文科发展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理论的非唯一性、非标准化。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与主张都会打下社会烙印,立场不同做出的判断就有所不同。文科的双重属性,使其与自然科学的专业、课程、内容相比,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因而,它具有特殊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涵养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科”建设是一项外部正效益极强的工程,也是具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性的工程。

### 一、“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需求

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发端于2018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四新”建设中明确表述为“新文科”。2019年5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式启动后,新文科建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认为,中国建设“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

第一,新科技革命与文科融合化。目前,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已经达成初步共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变革,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人类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

念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科学发展,人类创造了大量新知识,由此实现了许多技术突破,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5G技术等。这些新科技催生了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新业态,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营销、互联网教育、互联网诊疗风起云涌,“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基因技术+”奔腾而至。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知识复合、学科融合、实践能力强的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交叉新专业,促进开设新课程,探索育人新模式,且推动现有专业升级改造。同时,科技进步不断创造着研究学习的新方法新手段,新科技发展和新产业新业态产生持续引发着新的研究课题,不仅促进自然科学进步,也促进文科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推动文科研究内容与方法的融合创新。因此,“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长点 and 传统文科专业、课程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换代。

第二,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回顾历史,去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面向未来,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已经进入百年来最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特别是贯穿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处在历史新节点,传承中华文化根脉,创新文化发展,树牢文化自信,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交融是文科的新使命,即文科的时代性要求。而培养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任的人才,需要文科教育有新作为新气象。如何着力培养基础扎实、通古博今、创新力强的中国文化研究人才,以承担创新性发展职责;如何着力培养知识广博、通晓中外的跨文化研究与传播人才,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交融;如何着力培养知识复合、创造力和实践力强的文化创意人才,以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如何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高质量通识教育,进行有效的社会推广,树牢全民族文化自信,等等,都值得深思和探索。

第三,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首先,文科中国化需要正视教育教学内容中国化问题。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文科中不少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来自西方,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对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依赖性很强。这既体现了文科在开放活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快速发展,也暴露了自主研究不足的软肋。仅就经济学管理学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中国道路”,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

展经验及其规律的总结研究不够,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管理经验和本土案例的提炼分析不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体系的任务十分繁重,尚未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案例进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也很不平衡不充分。如何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点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如何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如何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着力凝练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充分展现中国学术话语的特色和优势,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科建设应该着力研究和破解的问题。其次,文科中国化需要正视培养目标和方法适应中国未来需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点规模和招生数量激增,对满足社会的经管人才急需贡献良多,但也暴露出一些偏向。就经济学管理学门类而言,一是功利化倾向比较严重,从专业增设、培养方案到课程设置,重应用型专业、轻理论型专业,增设应用类课程,大大压缩理论和史学课程,片面强调培养应用能力、忽视理论思维能力,高层次理论人才的培养力度和质量不容乐观;二是方法过度量化问题比较突出。在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学位论文要求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技术至上、忽视思想,非数理计量不成论文等问题;三是实践教学弱化,专业见习实习学时不足、质量监控缺失,不利于实践能力培养,更不利于深入把握中国国情。要真正培养高质量创新型引领性人才,未来担当社会发展民族



复兴大任,文科人才培养就要着力突破一些瓶颈,迈出新的改革步伐。

第四,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20世纪70年代以加入联合国为标志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到现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提出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因此,要着力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但与全球治理人才的需求相比,目前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对于高校文科建设而言,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通晓规则的高素质国际组织人才,加快培养适应全球新格局的高素质国际专业人才,包括外交人才、国际经贸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国际新闻人才、国际专利人才等,着力提高文科专业学生的全球视野、国际交往能力和全球就业能力,是全球新格局对文科发展的新要求。

## 二、“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任务

“新文科”建设的要义在于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以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指归，重点工作则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建设新专业或新方向。一方面，要着力建设交叉融合新专业（新方向）。要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探索建设适应引领时代发展的新专业（新方向），培养创新型专业人才。按照交叉融合范围和程度，新专业可分为以下情形。（1）人文科学内部融合的新专业。比如说国学人才培养，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史哲专业不打通，优秀国学人才很难培养出来。要培养出未来的国学大家大师，深度融合文史哲专业值得探索。（2）人文与社科融合的新专业。譬如，以外语+国政、外语+国经、外语+法学等模式培养复合型国际型人才培养，以融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于一体的PPE项目培养理论人才，都是有价值的改革探索。（3）文理融合的新专业。譬如金融科技、科技考古、计算社会学等，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与传统文科相结合，旨在培养业界学界创新发展急需的新型人才。（4）文工、文医融合的新专业。譬如，适应高层次专业化人才新需求，可探索文工交叉、本硕贯通的复合型甚至国际化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艺术设计与新媒体结合的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医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结合的护理康复人才培养等。另一方面，要推动现有专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的改革调整，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和未来发展潜力提升。譬如,以往新闻学科培养的人才主要适应各类传统媒体发展的需要,新文科则要致力于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这就需要进行培养方案的全面修订。再如,在新的社会需求和教育背景下,文科专业如何增开并开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编程技术等课程,优化调整实践课程结构,也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二,探索新模式。首先要探索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本研贯通模式。依据文科的新职责,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所需要的模式也不同。学术型人才的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统筹设计至关重要,真正实现宽口径、厚基础、长学制贯通培养,尤其是实行滚动式可淘汰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是培养精英国学人才、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人才的有效保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整合服务于人才培养的优质资源。一要实现高校与境内外教学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对于应用型人才,通过国内外机构的学习和实习,开拓视野,增强能力。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采取国内外高校、境内外机构(总部位于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总部,位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机构以及日内瓦、纽约的国际组织)学习实习的有机集成模式,培养效果良好。二要实现校政校企联合培养,提高培养质量。三要实现跨校跨院联合培养,探索双学位或主辅修、微专业的建设方法与实施策略。

第三,建设新课程。一是要开发新课程,改造老课程。既致力于开发适应新专业新方向的专业课程,如空间计量经济学,也要特别重视开发通识教育课程,如国学经典。二是要编写新教材,补充新内容。编写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发展、吸收新研究方法的新

教材,补充新内容。三是要运用新手段,开发新思维。着力打造线下、线上、混合式、虚拟仿真、社会实践等5类“金课”,让文科的教育教学理念、内容、手段、方法、学生考查标准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切实提高课程质量和学习成效。但对于文科而言,运用新手段不宜一刀切,不是旨在把课程内容呈现得炫目多彩,而关键在于因课而异,通过运用必要的新手段让学生的思维更活跃,理解更深刻,学习更有效,更具启迪创造性。

第四,构建新理论。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工作难度很大,需要执着探索和长期积累,目前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将“过程和关系”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山东大学资深教授曾繁仁一直致力于研究生态美学,深耕于基础理论领域,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生态美学理论体系。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案例。另外,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明、东西方跨文明对话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提出的需要新文科去探索解决的新课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有待于有识之士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进而言之,推进“新文科”建设还需要正视难点,破除障碍。首先,对于高校而言,主要是实现观念更新和改善制度供给。高校要充分认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对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充

分认识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和树立文化自信对高校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壮大对高校人才培养内容方法的新要求,充分认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角色对高校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充分认识“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此为基础,“新文科”建设既需要学院层面的规划,更需要学校的顶层设计,依据各自校情,加强专家论证,明确突破环节,解决重点问题。学校需进行制度创新,给予配套政策支持,解决新文科建设中学院、教师关心的瓶颈问题,鼓励跨学院联合建设新专业,鼓励实现校内外师资实验实训等资源的共享,鼓励教师开发新课程,加大引进与培养结合、专职与兼职结合的力度,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其次,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则要改革完善教育管理制度和优化评价体系。一是为了探索提高新文科学术精英人才培养质量,有效开展本硕博长学制贯通式培养,需要加大高水平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借鉴新工科建设经验,依据改革需求,更新专业口径,增设合理专业名称,支撑新文科建设与改革,避免旧瓶装新酒现象。三是改善学科学术评价导向,破除唯项目、唯经费、唯奖励倾向,以利于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协调发展,遵循不同学科规律科学发展。(作者: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教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文章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5期)

## 教育资讯

### 新文科建设大事记

■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召开。会上,成立了新文科建设工作组。

■ 2019年8月20日,山东大学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座谈会,初步形成“新文科”建设共识。

■ 2019年8月21日,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 2019年10月19日,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启动“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

■ 2019年10月22日,“新文科之新与创新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召开。

■ 2019年10月29日,《山东大学新文科建设工作方案(2019-2021年)》印发,是全国首个学校层面新文科建设方案。

■ 2019年11月10日,由山东大学和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务与教学管理学会联合主办的“新文科建设高峰论坛:从理念到行动”召开。

■ 2019年12月28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民族学类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暨民族学新文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召开。

■ 2020年6月17日,天津大学举行首届中国高校法学教育创新研讨会,发布《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成立倡议书》,成立法学教育创新联盟。

■ 2020年6月18日,南开大学召开新文科专业建设工作研讨会。

■ 2020年7月5日,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新文科视野下戏剧影视类专业、学科与课程建设论坛”

云端会议。

■ 2020年7月24日,“面向未来的新文科建设线上高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

■ 2020年8月17日,南京大学召开“新时代新文科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研讨会”。

■ 2020年8月24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员会、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举办“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端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暨阿拉伯语专业课程思政云端研讨会”。

■ 2020年9月20日,教育部外指委俄语分委会、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举办“新文科、新指南视域下高校俄语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与评价研讨会”。

■ 2020年9月20日,山东大学举办“全国新文科与外语人才培养院长论坛”。

■ 2020年10月19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新文科建设物流教指委主任扩大会议”。

■ 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依托山东大学成立的“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 2020年11月5日,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启动仪式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 2020年11月7日,首届中国高校PPE专业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 2020年11月14日,由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2020创意写作高端论坛”召开。

■ 2020年11月14日,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深圳大学召开。

■ 2020年11月14日,202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高校外语学院院长论坛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办。

■ 2020年11月14日,2020年甘肃省新文科建设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

■ 2020年11月21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

■ 2020年11月22日,“新文科语境下戏剧影视学科发展建设——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成都召开。

■ 2020年11月2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商科教育分会协办的新文科经管人才培养研讨会暨第二届(2020)全国高等学校经管院长本科教学联席会议召开。

■ 2020年11月27日,以“中国财经教育大变革:新机遇新挑战新使命”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校长论坛召开。

■ 2020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大讲堂启动仪式暨新时代经济学教育教学工作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 2020年12月8日,“新时代 新文科:全国艺术类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

■ 2020年12月25日,新文科与财政学类专业建设研讨会暨2018-2022年财政学教指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



## 他山之石

### 推进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方向与举措

黄有方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管理学理论和应用对中国的发展作用巨大。当前,管理学理论和应用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中国管理学理论、实践、工程已经形成中国式管理学发展的土壤,促使中国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 一、我国管理学专业的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高校管理学共有9个专业类、59种专业、9871个专业点,专业类和专业点数量为文科各门类中最多。管理学专业种类数占文科专业种类数的17.8%,管理学专业本科在校生数占文科在校生总数的33.9%,每种专业平均在校生5万人,在校生总数占比和平均在校生数均为文科各门类中最高。

第一,管理学专业要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管理研究能力,强化对国家战略管理的支撑作用。当前,全球管理理念、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交叉多元,迫切需要发挥管理学对国家战略管理的支撑作用。同时,要着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应该既有继承性、民族性,又有时代性、系统性,因此,要加强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研究,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

第二,在新文科建设的指引下,加强管理学与其他文科以及理工科学科的交叉融合。我国管理学实践的丰富性,要求管理学更多、更好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互动,促使学科发展带动管理实践发展,促进管理学专业学生积极进行社会实践,提升对新科技的兴趣与热情,掌握更多的新科技知识与技能。

第三,管理类专业课程设置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当前,传统的管理类专业课程结构有待优化、课程设置有待更新。同时,管理类专业也需要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加强融合。

## 二、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新文科建设责无旁贷。根据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与方向,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既要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大局,适应新科技革命的变革需求,也要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 1. 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大局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培养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科学素养和国家使命感的国家战略规划和管理人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是承载时代使命的重大工程,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就需要高校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事务、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全球性事务与全球治理的管理类人才。因此,管理类专业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 2. 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适应新科技革命的要求

新科技改变思维、新科技改变生活、新科技改变管理、新科技改变物流。当前物联网、大数据、5G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装备等技术发展迅猛,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科技深刻影响了管理学理念、环境、模式、价值、传播、共享、评判、效率等。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在

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给管理的依据、道德、伦理等带来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管理学专业要正确理性地看待和把握新兴科技,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与挑战,探索人类未来的走向。互联网、数据技术等新技术改变着现有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和产业内容,催生新产业的诞生,同时呼唤新管理。

### 3. 管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要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优化高校专业布局,实现人才培养结构、培养模式与国家需求相匹配,促进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链、创新链等相衔接。因此,管理学领域的新文科建设要体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推动管理学领域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组织形式的变革。

### 三、推进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举措

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推进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要进一步明确建设原则,高度关注国内外变革趋势,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改革实践,鼓励各高校开展特色创新实践。

#### 1. 明确管理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原则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对办学治校各环节的全面领导,在新文科建设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提高管理学领域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立足中国大地,服务国家发展。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取向必须是扎根中国大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体现自身价值。管理学专业要把握国际管理学领域的变革,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优势叠加效应,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融入和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

在各领域的应用,带来产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文科建设需要拥抱新科技,运用管理学的战略思维,加快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四是探索新时代管理人才培养的规律和方法。人才培养必须适应时代的新需求,新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要加快理论体系创新,完善以产教融合为主要途径的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建立管理类专业质量评价体系,提升管理人才培养质量。

五是弘扬与创新中国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要从研究中国的管理实践问题出发,在重视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把握数字化、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的新型管理实践,凸显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的时代性。

六是突出管理学领域人才培养的中国应用生态优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借助以上优势,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学领域人才培养体系。

## 2. 管理学领域要高度关注国内外变革趋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局势紧张,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然较多,管理学领域要及时跟进和观察国内外各机构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

管理学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要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指导意见和高等教育行动框架等目标及策略。同时也要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高等教育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其基于高等教育供给和治理等方面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重要趋势的预判。此外,各国的高等教育变革

趋势对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3. 研究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改革实践

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国内外高校都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以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我国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的实践为例，概述其新文科建设的有益经验。

**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本科生可以自由地探索各个学科领域，并且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学生直到大二秋季学期才被要求申报自己的专业，并且在整个本科学习过程中随时可以更改。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哈佛大学更强调通识教育，体现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多样化、通识课程设置结构合理、更注重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的特点。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全球知名的工科强校，在1947年成立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该校在20世纪中叶以后大力发展交叉学科，使学校实力不断增强，其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正是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

**山东大学：**山东大学通过升级改造“三层次、七模块”通识课程体系 and 成立山东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构建通识教育体系2.0工程。设立新文科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打造新文科教育教学研究理论高地。以建设文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跨学院和跨学科设立20个以上突出交叉融合的新兴文科人才培养项目、推进文科专业认证等，加强文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同时加大金专、金课、教材、实践、认证五位一体建设，构建系统的新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进行学科交叉多种方式的探索，例如新闻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进行大跨度交叉，开辟网络新闻传播方向。经济学院突出数量经济、发展经济学，哲学系突出生命哲

学,公共管理学院突出数字化城市管理、电子政务,法学院突出科技法学,中文系将语言学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厦门大学:**2020年,厦门大学开设首个“外国语言文学类+会计学/财务管理”班,主修涵盖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六个外语专业,辅修涵盖会计学、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两个专业。学生入学一周后,根据个人志愿、高考成绩及入学后的英语分级考试成绩进行分流,执行相应主修专业培养方案。

#### 4. 鼓励各高校开展特色创新实践

鼓励各类高校主动作为,立足中国实践、立足本校特色,开展管理学领域的新文科创新探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领域话语体系、形成理论体系,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

鼓励各高校规划与调整管理类专业布局。坚持需求导向,超前布局,主动应变,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对管理类专业教育的周期性、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满足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对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需求。

鼓励各高校改革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强化管理类专业课程目标覆盖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的深度,探索课程打通、模块设计,加强其他门类专业与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的融合,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及分散教学与集中教学结合的学习模式。

鼓励各高校强化管理类专业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培养人才机制,提升管理类专业建设与社会新形势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适应度。提高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比重,借助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和教师科研项目等载体和平台,加强对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各高校调整管理

类专业质量评价体系。坚持目标导向，过程监测，形成新文科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教学评价标准、专业评估/认证体系和机制，学校自评价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提高管理类专业教学质量保障。

鼓励各文科教指委在新文科建设中发挥指导作用。2020年10月，新文科建设物流教指委主任扩大会议召开，研究管理类专业的新文科建设思考和物流类专业在新文科建设中的举措。会议希望各高校要主动作为、深入研究，围绕专业布局调整、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创新、质量保障与评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物流类专业新文科建设。（作者：黄有方，上海海事大学原校长；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

## 新文科建设典型案例

■ 清华大学“清华简”专项研究成果显著。2017年，清华大学制定《关于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进文科建设“双高”计划的实施意见》，在创新学科方向、重点基地建设、影响力提升计划及软科学研究计划等领域开展数百个项目，基地建设扎实推进，协同创新中心成绩突出。成功举办10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成果发布会，其中清华简《算表》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荣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唯一一项一等奖。清华简专项工作稳步推进，研究成果非常显著。

■ 北京大学新文科教育建设思路及成效。建设思路：一是强化文科在所有学科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为新文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强化文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破除学科间壁垒，激发创新活力；三是强化文科在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树立其在育人方面的核心地位。建设成效：一是通识教育建设，近年新建的89门通识核心

课程中有63门文科课程；二是跨学科本科项目建设，2016年以来新设立新文科跨学科人才培养专业和项目10个；三是教学体系革新，加强书院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坚持社会实践与课堂教授相结合，增强文化认同和学习的现实取向，如元培书院开展的书院制与导师制相融合的培养模式改革。

■ **四川大学推出文科大师领衔的系列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深化专业供给侧改革，强化跨学科交叉融合，夯实文科拔尖人才基础，与行业合作协同育人，聚焦厚通识、宽视野、多交叉，打造有影响力的一流课程。首批文科专家领衔建设的《大道之行：中华文明简史》《视觉的诗篇：艺术的精神与意义》等19门有川大特色、有中国温度、有社会影响力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已开课，在中国大学MOOC等平台上线文科类课程71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9门。其中，《走进杜甫》《中国现代文学》《巴蜀文化》获“最美慕课”称号。

■ **南开大学：着力打造南开特色新文科建设模式。** 南开大学坚持“四个四”改革思路，打造南开特色新文科建设模式，培育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建设成果显著。经管法班等特色班建设实践有力推进学科交融互渗、协同共享；数字贸易、数字文旅、网络与新媒体等多学科融合有序推进；数10门以服务学习系列课程为代表的项目制学科融合“金课”，在校内外发挥显著示范效应；借助“校一院一班”三级学业指导体系、助教体系及智慧书院等载体，以数字化教育革命拓展课堂内外、校园内外、线上线下的无边界教学空间，催生新的教学生态，形成师生共同体，保障新文科建设行稳致远。

■ **山东大学“四位一体”新文科建设模式。** 教育部推出新文科后，山东大学在全国率先发布《新文科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山大风格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以“新



理论、新专业、新模式、新课程”为特征的“四位一体”新文科建设模式，建设成果显著。**专业建设方面**，10个文科专业首批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9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入选拔尖人才培养2.0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3个专业入选强基计划。**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增设PPE校级基地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护理学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与信息双学位项目；增设知识产权管理、创新转化管理等7个新文科微专业，构建由专业(majors)-辅修(minor)-微专业(micro)构成的3M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课程建设方面**，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精神概论、中国审美文化史、外语话中华等新文科特色课程，17门文科课程入选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计划，10门国学经典系列慕课上线，中华原典、艺术汇和领读经典三个系列慕课制作完成。基于中华文化体验馆、博物馆、文学生活馆、校史馆等建设系列体验式课程，全面升级通识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在《中国大学教学》《中华读书报》等发表系列新文科研究论文，深入探讨新文科内涵及建设路径。

■ **中国人民大学：新体系·新模式·新课程·新平台。** **新体系**，全面构建大类培养体系，整合本科专业，实施学生自主选择学院、专业的分流机制。**新模式**，设立明德书院、明理书院，探索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与学生学习生活社区三位一体的特色书院模式；成立数学学院、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促进文理工融合发展和新时代人文社科转型升级。**新课程**，重构通识教育体系，重点打造100门通识核心课程。**新平台**，推进信息技术交叉应用的新文科平台建设，建设数字清史、数据法学、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大数据、国际传播大数据智能、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中国古代文化体验与实验中心等新文科主题实验室，建设11个信息技术交叉应用的研究实践平台和

一批产学研校企合作平台；整合集中性物理空间 6000 平米，建设虚拟现实中心、实验教学中心和学生创新中心。

■ **华东师范大学传统优势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 通过制定多学科交叉计划、打造跨学科团队、建设跨学科课程等举措，积极推动传统优势人文学科创新发展。中文系“元化班”国家拔尖计划 2.0 基地，以文史哲大类培养、多学科导师、新形态教学模式运用创新学生学习方式，促进学科交叉。历史学系“思勉班”国家拔尖计划 2.0 基地，探索“历史+”TSM 人才培养体系。“新闻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联合培养科学和人文素养全面、具有规划新闻传播实践业务前沿发展能力、具备数据科学研究者能力和新闻传播业务领导者潜力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商周古文字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将文化、历史、思想等融入商周古文字教学。依托“大夏书院”连接人文社科类 8 家院系，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多元化、综合性发展平台。

■ **北京语言大学新文科专业建设的初步探索。** 北京语言大学从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生教育的现实需求出发，以一流学科建设促进一流专业建设，形成具有新文科特点的专业建设路径。一是传统专业复合化。推出“汉语+”“英语+”等多样化培养模式，开设复语教育方面的多个专业方向；打破学科壁垒，不断推进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二是新设专业特色化。设立有特色的新专业，设置“语言+智能”跨学科专业，设立跨学科实验班等。三是培养方案立体化。以学生为中心，强化通识教育，形成“思想教育+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立体化培养方案。四是课堂教学智能化。将“互联网+”“教育技术+”等信息化手段融入课堂教学，引领学生养成新时代必备的信息能力与素养。

■ **中国传媒大学建立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育人平台。** 为适应媒

体融合发展需求,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索贝·华栖云、艾迪普合作建设**全媒体运行中心**。为进一步深化AI虚拟主播与情感计算关键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示范研究,建设**AI虚拟主播实验室**。联合北京歌华有线、东方嘉影,推出“**光明影院**”项目。为切实推动抗疫精神进校园,激励新闻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构建了一门案例鲜活、剖析细致、讲述深入、手段融合的大课程《**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来自武汉抗疫一线的报道**》。为整合文化资源,挖掘文化记忆,传承文化根脉,创新数字化、移动化、影像化的文化呈现形式,用数字技术为文化传播赋能,创建“**数字文化中国**”项目。

■ **山东师范大学聚合力量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建立完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以山东省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研究基地和中国文学经典与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为平台,召开文化创意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高峰论坛,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积极对接产业,完成稼轩文化城研究课题,与行业深度融合,合作开发传统文化产品。建设9个省内一流的中国语言文学综合实验室,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

■ **东莞理工学院“六加强六引导”新文科建设模式。** 作为省市共建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范校,东莞理工学院紧把握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围绕服务地方文化软实力提升,初步形成加强需求牵引、平台支撑、学科资源、专业结构优化、课程集群和能力育人,引导研学产业化、教学场景化、学科协同化、文工交叉化、理论实用化、育人立体化的“六加强六引导”的新文科建设模式。

(摘自公众号“全国新文科” 2020年12月31日)

呈:校领导

---

送:全校各管理部门、院系主要负责人

2021年2月10日